

善用台灣優勢 立足東亞放眼世界

借鏡小國經驗 迎接生存之戰

文 / 林偉妃整理

編按：

曾經是開發中國家發展與分配模範生的台灣，在面對全球化浪潮的衝擊，卻因無法善用既有優勢，自外於全球和兩岸，不但未享受東亞區域發展的成果，反而先嚐盡鎖國之下的惡果。

因為在全球化之下，資本與技術流動快速跨越藩籬，不斷向廉價的原料、土地、勞力和租稅優惠的新興市場邁進，快速資本移動造成本土產業外移，同步帶走白領、藍領工作機會的大環境驅使下，造成台灣貧富差距逐漸拉大、中產階級萎縮，出現所謂「M型社會」現象。

過去幾年，時報文教基金會曾經先後就如何建構宏觀包容的社會、如何推動租稅與金融體制的改革，舉辦過一系列研討會，如今眼看著台灣在全球化下，未受其利先受其害，在立法和行政的執行效率、租稅與金融機制以及教育規劃都和世界逐漸脫節，台灣，已經到必須面對問題，展開思索與討論的時刻。

全 球化浪潮席捲各地，
全 面對全球化潮流，台



◆蕭萬長先生

灣最基本的兩個策略，一方面對全球開放，另一方面藉由政策革新來提升經濟實力。

兩岸關係應放在全球脈絡下思考，自由貿易區則是台灣必經之路，台灣若一味自我設限，到頭來吃虧的還是自己。

蕭萬長：兩岸關係應放在全球脈絡下思考

台灣不可能去阻擋全球化的風潮，只能順勢而為，但近來台灣在因應全球化下的

兩岸關係時，卻面臨極大的困難。雖然有人不同意這樣的說法，但對台灣而言，全球化主要內涵在相當程度上是「中國化」，這三個字會引起政治上的敏感，但就經濟面，兩岸連結整合已是既成事實，而這個事實不只發生在台灣，對許多國家而言，或多或少也是如此。

過去多年來，台灣官方希望以人為干預降低全球化中國因素帶來的衝擊，如刻意阻礙資本移動，提高運輸通訊成本。

但在全球化時代，決策者必須體認限制措施的成本越來越高，效益卻越來越低，若執意推行，可能綁死自己，或因效力不彰，讓政府威信越來越低，而這些情況就發生在過去幾年的兩岸關係上。

以經濟力可為區域穩定基礎

經濟力量可以做為區域穩定的基礎，彼此經濟關係越密切，越不容易藉由激烈手段打破現有平衡，因此兩岸密切的經貿往來，對台海穩定將是正面因素，台灣若被

排除在東亞經濟整合外，則不利於台灣安全，「這是動態、互動的過程，不是零與一的問題，沒有互動機會，就什麼都沒有了」。

至於要如何打破兩岸僵局，帶給台灣在全球化競爭的不利？台灣應以全球定位為思考，儘早走上對全球開放的自由貿易區之路，不但能降低單一中國因素造成的心理不安，也有機會以低稅賦吸引台資及外資回流登台，藉此讓弱勢產業轉型，「全球化讓對外開放政策不可逆轉，但開放帶來的負面效應，可以利用分配政策來因應」。

詹中原：政黨更應有明確政策路線

面對全球化的國際競爭，台灣一方面要對全球開放，另一方面要藉政策革新提升自己實力，唯有如此，台灣才不會把中國因素極大化，才能走出「恐中」陰影。

綜觀全世界先進民主國家政黨，舉凡英國工黨、保守黨，美國民主黨、共和黨，德國基民黨、社民黨，法國



◆詹中原/政治大學公行系教授

社會黨，無一不有清晰明顯的「政策路線」。政策路線是政黨的領航器，也是凝聚黨員向心力的吸鐵石，更是政黨向全民解釋執政願景的藍圖；政黨失去了政策路線，追求執政，也只是權位鬥爭的代名詞。

公共政策不單只有「左右」立場，應該還有「上下」問題。這個「上下」，原本應是政策哲學基礎的上游，影響到實際政策產出的「下游」，如何避免國家政策繼續「不上不下、忽左忽右、搖擺矛盾」。

但左右派和上下游問題，到了台灣卻變成只是擔心「誰上誰下(台)」了。陳水扁總統曾經說過，台灣沒有左右問題，只有國家認同分歧問題。基本上台灣不是沒有左右問題，「而是大家不知道左右在哪裡！」台灣不僅不左不右、不上不下，也缺乏中心。



◆朱敬一/中央研究院院士

朱敬一：生存問題位階應高於認同

簡單地說，世界對強者而言是平的，可是數千年來，以武力刀槍征服世界的強者，東方只有一個成吉思汗。不過，經過資訊革命和通訊革命之後，在經濟上，世界對我們而言，存在著千百百潛在的成吉思汗，可以使用經濟力量把我們踏平，全球化真是一個生存的挑戰。

此外，這個普及於世界的生存挑戰，對一國之內弱勢者的衝擊通常比較大，所以就台灣內部而言，這也是對弱勢的一個挑戰。有人說，台灣沒有左右問題，而是認同問題；其實，面對全球化的衝擊，台灣的生存問題，位階高於認同問題。

朱雲鵬：走向開放經濟

全球化的過程中，生存在一個新世界的巨大洪流之



◆朱雲鵬/中央大學台經中心主任

下，台灣應該怎麼做？

首先提到的是我認為台灣應當走自由開放、與國際銜接的經濟路線。無論從歷史或地理來看，台灣的歷程、規模、人民特性、對於東亞的位置等，其經濟發展皆與世界接軌過，是整個中國地區最早融入世界貿易體系的地方之一。

檢視台灣的成長的軌跡，就是走國際經濟的路線，帶來當時的突飛猛進；今後也是一樣，因為台灣的本地的市場不夠大，無法達到大規模的生產，必須變成世界分工體系的一部分，才能夠發展出足夠的規模及能力，也方能在世界舞台上，佔有一席之地。

理性討論 和世界接軌

然而，國內因政治因素，使得我們一碰到「中國」二字，很多政策無法理性討論。雖然全球化下，我們應



◆林萬億/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

走上開放經濟的路，讓企業前往世界各地發揮長才，但台商卻受到重重限制，限制的結果則是「台灣企業的競爭力」與「台灣的競爭力」這兩個本來應該相等的概念，最後竟然脫節。

其次，我認為台灣一定要走民主與法治的路。台灣社會如此紛歧，民主根基相形薄弱。無論政黨、政治人物、選民的行為，完全不像一個民主成熟國家所應展現出來的風貌。台灣多年來實施選舉，但不表示台灣擁有民主；即便台灣有了民主，也不代表台灣落實法治。

林萬億：多元思維落地生根

我們必須承認，經濟的發展不必然自動帶來分配的公平。即使市場有一定程度解決問題的能力，但國家的確仍需要理性的、有證據基礎的介入，不能莽撞憑感覺。介入的過程中，也應具備對

人的關懷、對環境的敏感，考慮整體的負荷，掌握核心的價值；這個價值不能只是冰冷的數字，更需富含對人與環境的理解和感受。

「多元化」是全球化的特徵之一，若未認清此一趨勢，很容易造成社會內部

對立，導致舊的歷史對立未及消除，新的對立又悄然而生。

舉例而言，全球化必然帶動區域經濟的統整，本來資源豐富的地方會持續擴張，但像雲林、彰化等鄉下地方，素來資源短缺，人力也不足，若缺乏

計畫性的關注，極易導致邊緣化，或成為持續擴大的對立。

既有全球視野 也有在地關懷

除此之外，新來的以及後到的「移民」，也是全球化下可能涉及對立問題的

因素。過去外省和本省已經造成某種程度的焦慮，如今新移民及數十萬以上的新移民之子在台灣的生活及發展，整個社會將如何因應涵納，使他們不致感受到教育的差異、就業機會的不足、文化不能相容。治本之道是要讓多元



◆議題一 全球化的衝擊討論中，專家學者提出精闢的見解，左起為賴幸媛委員、華而誠教授、徐小波董事長、朱敬一院士、孫震教授、陳添枝教授、何美玥主委、林垂宙教授、林祖嘉教授。

的思維能在台灣落地生根，而且在各個生活層面實踐出來。

最後，我希望提醒，許多結果並非單一因素所導致，切勿以「貪得無厭」看待經濟發展，亦不宜以「弱勢者懶惰、依賴」看待社會福利，應該互相調和，既有全球視野，也要有在地關懷。

黃榮村：人才培育國際化

全球化之下，人才培育面對的挑戰，大致有二：首先必須考慮，如何讓下一代人才的培育，不因M型社會來臨及經濟的不均而受害？其次則是思考，如何調整教育的方式，以培育出可以正面迎戰M型社會的人才，使其擁有最佳的適應能力，以及向上流動的機會？

過去，台灣有許多人的教育成就，受到家庭及社會經濟因素介入影響。這個問題我們雖有改善，但新的全球



◆黃榮村/中國醫藥大學校長

化浪潮，卻又帶來另一波衝擊。例如，在大學階段，中上階層家庭的小孩因享有補習資源，較易進入學雜費低廉的公立學校，而中下階層的小孩卻就讀學雜費較高的私立學校，又如新移民子女的教育，如何讓外籍配偶子女跳脫環境不足、資源不足、發展不足的迴圈，讓他們的未來變得更好，這是M型社會來臨時第一類要考量的問題。

當務之急提升英語能力

此外，不能再以過去的格局辦教育，而要以國際的標準與人才培育的方式，讓台灣未來人才走上全球路線。其中提升英語能力是首要之務，語言的問題如獲解決，技職體系人才特別是服務業或設計類等，可以充分對外釋出，形成跨國際流動，這是迎戰M型社會第二類要籌思的問題。



◆薛琦/金融研訓院院長

以上兩者都涉及制度與國家策略，所以我們主張必須擬定國家人才培育白皮書。在制度設計時，消極方面，必須去打消源自於社會經濟因素而形成的壁壘。積極方面，必須去培養多元創意的教學及選才方式，更新教育的內容以及基本的能力。

諸如基本能力、就業能力、教育產業國際化、WTO談判等關於人才培育的基本議題，也有待解決，才能讓台灣真正參與國際交流，進而成為整個世界體系的一環。

薛琦：市場開放面對衝擊

想要與別人競爭，需要移動得比別人快，或至少一樣快；就算真的移不動，也可以思考其他的因應方式。台灣過去發展的經驗，就是一個市場開放的歷史過程，很遺憾地，我們現今竟是反其道而行，日後必將為此付出代價。

政府認為市場開放會對台灣帶來衝擊，但誠言之，那就是市場開放的目的啊！面對衝擊，只要好好克服困難，謹慎因應，經濟自會往前走。最壞的作法是把門關起來，便以為困難不復存在，殊不知這是自欺欺人，國家空轉而停在原點。我的比喻是：市場就像降落傘，你要使用它以求活命的時

候，一定要打開。

福利政策兼顧發展

至於M型社會化的問題，如果我們不只區分五等分，而是以十等分、二十等分進行社會測量，最高所得者控制的資源，一定是增加的，也就是說，一經細分之後，M型會變得很明顯。我們可以看到，有些人五十五歲便決定退休，開始享受老年生活，至於全世界的公務人員，平均也在六十五歲退休，但他們之中，其實仍有許多可以繼續工作、生產的人力資源。由此可見，最低工資不是企業的責任，而是政府的責任。經濟學不反對福利政策，但經濟學家比較擔心福利政策會去傷害工作的誘因，以退休制度來看，正是最好的例子。

再以美國的制度來看，如果所得極低或沒有所得，政府當然會提供幫助；但是，如果有工作而所得不高，此時政府提供的幫助更多。這是一個對的制度。一九九五年柯林頓主政時，美國的貧窮人口為五·五%，但至他卸任時，已剩下二·五%的貧窮人口。柯林頓的作法是讓窮人回到工作的場所，這是很偉大的成就。因為失業不只是所得的問題，更是人的尊嚴的問題。